

西藏问题与印度“中国扩张”叙事的形成（1959—1964）

薛宁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1959年以后，西藏问题成为印度解释对华关系变化的重要议题。印度官方文件、尼赫鲁讲话及《印度斯坦时报》相关报道显示，印度官方在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同时强调西藏自治权利；当自治、难民与北部边疆安全相联系时，中国在西藏的行动被赋予了改变地区现状的含义。报刊中使用“压迫”“侵略”等措辞，将西藏局势进一步延伸为对亚洲邻国的威胁。殖民时期遗留的缓冲观念与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政治争论，为“中国扩张”叙事提供了背景条件。

关键词：西藏问题；中印关系；《印度斯坦时报》；“中国扩张”叙事

DOI: doi.org/10.70693/202609177733

1959年西藏局势变化及达赖喇嘛进入印度，使西藏问题同中印边境争端的联系更为紧密。印度官方在讨论西藏主权与自治时，将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同本国北部边疆安全相联系，并在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同时批评中国对西藏地区的治理行为。报刊所载的相关言论进一步使用“侵略”“扩张”等评价性词汇，使西藏问题成为印度解释对华关系变化的重要议题。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中印边界政策、中印外交交涉与中印边境战争政策展开，近年来，部分学者进一步考察了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跨境活动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②，以及中印两国加强边境地区行政管理、争取当地居民支持的过程^③。在此基础上，本文以1959—1964年的印度外交文件、尼赫鲁讲话及《印度斯坦时报》相关材料为中心，考察官方涉藏表述在报刊中的体现及“中国扩张”叙事的形成背景与政治作用。《印度斯坦时报》是20世纪60年代印度重要的全国性英语报纸之一，长期报道外交、安全与边界问题，其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精英和城市中层中的主流对华认识。同时，该报涵盖报道、评论与读者来信，便于比较不同主体的表达，并分析官方言论与报刊讨论的联系。本文认为，印度将西藏问题与边疆安全焦虑相结合，为“中国扩张”叙事提供了论述依据；报刊对相关言论的选择与呈现，则推动了这一解释的传播。

一、印度官方对西藏地位与中国行为的表述

1959年3月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西藏问题在印度官方话语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不仅仅被视为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印度政府还将其与中印边界争端和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变化集中反映在印度外交部陆续公布的《白皮书：印中两国政府来往照会、备忘录、信件和签署的协议》中。《白皮书》第3卷序言明确说明，该卷收录的是1959年11月4日以来两国政府互换的备忘录、函件及信件，并由印度外交部提交议会审议。^④通过持续公布相关外交文件，印度政府将原本属于外交层面的议题逐渐转化为议会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政府并未直接否认中国与西藏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通过区分并交替使用“主权”与“宗主权”，重新界定中国与西藏的关系。1959年9月4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关于是否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声明中指出，中国长期声称西藏“受其主权或宗主权管辖”，而西藏则“被视为处于中国宗主权或主权之下”。

作者简介：薛宁（2001—），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② 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③ Bérénice Guyot-Réchard,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印度外交部编：《白皮书：印中两国政府来往照会、备忘录、信件和签署的协议》（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White Paper: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第3卷，新德里：印度政府出版社1960年版，序言。以下简称《白皮书》。

的自治国家”。与此同时，他强调“自1911年以来约四十年间，西藏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状态”。^①尼赫鲁一方面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一方面指出“西藏是中国国家的一部分，同时是一个自治地区”。^②这种表述并未完全否认中国政府与西藏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通过突出西藏存在的自治传统淡化中国对西藏行使完整主权的含义。事实上，印度官方关于西藏地位的表述始终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尼赫鲁在回应议员质询时曾明确指出：

“我们不可避免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称之为宗主权也好，称之为主权也好……”^③；在一场讨论中，他强调印度及其他国家历来的立场，一直是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形式的宗主权或主权”^④。这种并列“宗主权”与“主权”的做法，在1962年人民院关于1954年《中印西藏协定》的辩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当议员质疑是否由于密码翻译错误而将原本应为“主权”误写为“宗主权”时，尼赫鲁明确回答：“我们当然使用的是‘宗主权’这个词”，随后又表示，印度在与中国的往来函件中一直承认中国在历史上若干时期“曾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但中国方面始终不接受这一说法”^⑤。尼赫鲁甚至反问：“难道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四处争论，只因为他们说‘主权’，而我们说‘宗主权’吗？”^⑥这表明，对印度政府而言，“宗主权”与“主权”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术语问题，而是关于西藏历史解释权的争夺。通过保留“宗主权”这一表述，印度官方既没有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为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和自治传统留下了语言空间。

在重新解释西藏地位的同时，印度政府进一步通过突出“自治传统”和“难民问题”，塑造中国改变西藏既有状态的形象。1959年4月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尼赫鲁首先将这一事件界定为政治避难问题，强调达赖喇嘛是应本人请求进入印度，印度政府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提供庇护，而非主动介入西藏事务。^⑦随着西藏难民不断涌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尼赫鲁开始更多使用“难民”“避难”“解除武装”等词汇，使西藏问题逐渐同地区危机及边境安全紧密联系起来。^⑧1964-1965年度外交部报告中宣称，中国政府试图“以武力消灭中国曾郑重承诺予以尊重的西藏自治”^⑨。该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破坏了西藏传统的自治”，而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地区紧张局势。^⑩在印度官方的叙述中，西藏不再被视为中国内部秩序调整的问题，而成为影响喜马拉雅边境稳定、造成难民外溢并威胁印度安全的地区性危机。

比起“宗主权”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印度官方描述中国行为时所使用的语言。尼赫鲁在1962年人民院辩论中表示，中国是通过“向西藏派遣军队”实现其目标的^⑪。《白皮书》第10卷则称“中国人直到1950年才进入西藏”^⑫；《1963年外交事务记录》进一步强调：“从中国进入西藏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感到一种新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我们”^⑬；甚至在1964年的议会讨论中直接使用了“中国对西藏的进攻”这一表述。^⑭与“恢复中央政府权力”“重新统一国家”等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的说法相比，“进入西藏”“向西藏派遣军队”“进攻西藏”等措辞均带有明显的外部进入意味。这类措辞的使用实际上将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行为重新定义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既有状态的改变，中国逐渐被塑造为改变现状、威胁边境稳定和破坏地区和平的行动者，而非在西藏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央政府。同时，这种官方叙事也为《印度斯坦时报》等媒体塑造“中国威胁”形象提供了基本的叙述框架。

二、《印度斯坦时报》涉藏报道中的“中国扩张”叙事

印度政府通过《白皮书》、外交照会等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官方界定，《印度斯坦时报》则将这些官方表述传播至更广泛的公众。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使用“压迫”“侵略”“威胁”等语言，将西藏问题与人道主义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针对1959年的拉萨局势，报道明显强化了“中国压迫—藏人反抗”的叙事结

^① Jawaharlal Nehru, “Statement on Tibet,” *Lok Sabha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vol. 32, no. 21, September 4, 1959, cols. 3922-3923.

^②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5 (1959), p. 90.

^③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5 (1959), p. 51.

^④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5 (1959), pp. 89-90.

^⑤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8 (1962), pp. 100-101.

^⑥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8 (1962), pp. 101-102.

^⑦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5 (1959), pp. 109-110.

^⑧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5 (1959), pp. 121-133.

^⑨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1964-65*, p. 105.

^⑩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1964-65*, p. 107.

^⑪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8 (1962), pp. 100-101.

^⑫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t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1, 1963, in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White Paper X*,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4, p. 2.

^⑬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9 (1963), p. 489.

^⑭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10 (1964), p. 265.

构。《拉萨爆发战斗》报道称,事件起因是中国方面要求达赖喇嘛在没有警卫的情况下单独前往中国当局所在地,而这一消息引发藏人强烈不安,“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藏人包围了布达拉宫,阻止达赖喇嘛离开宫殿”^①。该报道并没有从“中国中央政府处理地方叛乱”的角度展开,而是突出中方要求、藏人不安和达赖喇嘛人身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呼应的是另一篇报道称中国当局因正在对“西藏叛乱者”采取强力军事行动,劝告印度人不要因朝圣或其他目的进入西藏,并警告违者须自负风险^②。这类报道将西藏问题从主权争议转化为“弱势地区受到强权压迫”的安全问题。

其次,报道中大量使用“侵略”“镇压”“奴役”等词汇,为中国在西藏的行为赋予了鲜明的负面含义。题为《印度必须就西藏问题给出裁决》的报道称,印度应当承认“侵略行为已经发生在西藏”,并称“一个弱国的自由已经被一个强大的邻国扑灭”^③。另一篇报道称,中国政府“使用了残暴和不人道的手段来镇压西藏的民族运动”,并试图“用一切手段,无论多么残忍或卑劣,来镇压对其统治的所有抵抗”,除此之外还特别强调,中国方面正在“系统地破坏和摧毁佛教的生活方式及其所有制度”,并称“大规模屠杀已经发生,难以言喻的暴行已经犯下”^④。在描述中国政府对西藏采取的宗教和文化政策时,报道进一步将这些行动解释为“强权压迫”,从而引导读者同情西藏方面的处境。与此同时,报道仍然围绕“宗主权”与“自治”展开讨论,但其表达方式已经与外交文件中的谨慎表述大为不同。报道指出“中国军队是在1950-1951年进入西藏的,而西藏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没有军事力量与中国抗衡,才接受了中国宗主权”,甚至追问道:“这种靠枪炮建立的联系是合法的吗?”^⑤报道一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主张,一边强调西藏的自治权无可争议,而当前西藏暴力事件的根源,正是中国试图“将其对西藏的宗主权升级为完全主权,并将西藏的自治地位降为奴役状态”^⑥。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潘尼迦的作用》一文中,作者指出,即便接受中国对西藏享有某种“宗主权”,也不能据此证明中国有权借助武力取消西藏自治;相反,1954年《中印协定》本身已经默认了西藏在中国主权之下继续保持自治的特殊地位。^⑦由此,报道将原本属于外交层面的“宗主权”与“自治”争论转化为一种大众化的道德判断:即使承认中国拥有某种权利,也不能证明其有权取消西藏原有的自治地位。

另外,媒体报道进一步把西藏问题与中国扩张主义和印度边境安全联系起来,使其由人道主义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议题。报道将中国在西藏的行动称为“更隐蔽、更无情的殖民主义”,并认为其目的并不止于西藏,而是向印度及其他亚洲邻国扩展政治影响,甚至可能把西藏山区变为“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及训练营”^⑧。英国议员芬纳·布洛克韦声称反殖民主义者必须谴责“共产党国家犯下的帝国主义压迫”,强调人们不能对“中国在西藏的更致命的行动保持沉默”^⑨。由此,中国由反殖民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转而被刻画为可能威胁亚洲新兴民族国家的扩张性力量。随着边界争端升级,西藏问题中的“侵略”语言被直接用于解释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形象由西藏问题中的“强势行为者”,进一步演变为印度边境安全的主要威胁。多数反对党议员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拖延通信往来巩固其在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非法强行占领地区”的地位^⑩。与此同时,“随着西藏这一障碍的消失,中国侵略已经逼近印度边境”这类语言与周恩来访印期间地方报纸编辑绝食抗议的消息都表明西藏问题已经由中印两国的外交争议扩展为社会舆论与动员议题。

由此可见,《印度斯坦时报》对西藏问题的报道并非简单重复官方立场,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完成了再诠释。外交文本中的“宗主权”“自治”和“传统关系”被逐渐置换为“侵略”“压迫”“扩张”等概念,西藏问题也由中国与西藏关系的历史争议转变为印度社会理解“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起点。

三、“中国扩张”叙事的形成背景与政治作用

西藏问题之所以能够在1959年以后被印度官方和媒体迅速塑造成“中国扩张主义”的象征,并不只是因为西藏局势本身发生了变化,更在于这一叙事契合了印度独立后长期存在的边疆安全焦虑。英属印度时期,喜马拉雅边疆并不是单纯的地理边界,而是一套以西藏为缓冲地带的战略体系。1914年西姆拉会议所形成的边界安排,

① “Fighting Breaks Out in Lhasa: Tibetans Resent Chinese Order On Dalai Lama; Demonstration before Indian Consulate,” *Hindustan Times*, March 21, 1959.

② “Chinese Tell Indians Not To Visit Tibet,” *Hindustan Times*, August 24, 1959.

③ “Indian Must Give Her Verdict on Tibet, Says J. P.,” *Hindustan Times*, March 28, 1959.

④ “Happenings in Tibet Not an Internal Affair of China: Narayan Urges Fresh Thinking on Issue,” *Hindustan Times*, April 10, 1960.

⑤ “The Rape of Tibet,” *Hindustan Times*, April 23, 1959.

⑥ “Naked Aggression in Tibet,” *Hindustan Times*, April 3, 1959.

⑦ “Letters to the Editor: Panikkar’s Role,” *Hindustan Times*, December 6, 1963.

⑧ “Chinese Reds a Menace to Asian Countries: Delhi Convention Proposal to Rally World Opinion,” *Hindustan Times*, April 11, 1960.

⑨ “India Should Take Lead in Solving Tibet Issue: Brockway’s Suggestion to J. P. Narayan,” *Hindustan Times*, April 12, 1959.

⑩ “Kripalani Calls for ‘Strong, Positive’ Action: Deadline Sought For Negotiations,” *Hindustan Times*, December 23, 1959.

一方面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另一方面又强调“外西藏”的自治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独立性。^①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属印度时期的边界主张，尤其是麦克马洪线，同时也继承了殖民时期边界安排所包含的历史模糊性与政治不确定性。因此，当中国政府逐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时，印度政府感受到的并不仅是邻国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内部管理，而是印度认为的原有缓冲体系的消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印度对北部边疆安全环境的认识随之发生变化，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②

印度官方将西藏问题与印度北部边疆安全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并不是始于1959年，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就已经开始了。尼赫鲁在议会讨论中承认，中国进入西藏后，印度感到“一种新的危险”正在逼近其北部边境。^③在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同时，尼赫鲁政府仍然重视西藏的缓冲作用，并未完全摆脱英属印度时期形成的相关战略观念。^④另外，印度外交官潘尼迦等人曾认为，中国有效控制西藏可能导致中国重新提出对尼泊尔、不丹、锡金以及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主张。因此，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和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并非“中国威胁论”的起源，而是将此前存在于边疆政策中的不安公开化、政治化和大众化。

在国内政治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扩张”叙事具有转移政治压力和重新界定危机责任的作用。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署后，尼赫鲁长期强调中印友好与和平共处。然而，1959年前后出现的阿克赛钦公路、朗久事件、空喀山口冲突等边境事件动摇了尼赫鲁政府此前对中印边境关系的乐观判断。尼赫鲁在1959年4月的记者会上仍然试图维持外交上的谨慎，指出1954年协定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二是西藏享有自治；但同时承认“现在显然没有西藏自治”^⑤。这一表述既没有直接否认印度过去承认中国在西藏地位的外交立场，又为印度重新解释中国行为留下了空间。换言之，印度官方可以将问题的焦点从“中国是否拥有西藏主权”转移到“中国是否破坏了西藏自治”以及“中国是否因此改变了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环境”上。随着边境事件日益增多，尼赫鲁政府面对的压力也随之加重。1959年12月，尼赫鲁在人民院谈到中印关系时，明确将局势恶化归因于“中国人员最近侵入印度领土”，并称这些“侵入”造成了印度方面的忧虑。^⑥与此同时，议会反对派和部分议员不断质疑政府是否低估了中国在西藏和边境地区的行动。反对派领袖兰加（Ranga）要求政府“清除中国的侵略”，并将政府的边境政策失败与克什米尔、防务准备、粮食供应等国内问题并列讨论。报道甚至以“把中国人赶出去”为标题，直接将外交和边界争端转化为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⑦由此可见，“中国扩张论”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情绪化表达，而是在议会政治、边境事件和媒体传播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在这一背景下，连续出版的《白皮书》就不仅是外交文件汇编，也是印度政府向议会和公众说明边境危机的一种叙事工具。印度官方文件的公开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是理解印度如何将自身边界主张转化为政治与安全叙事的重要线索。^⑧《白皮书》第3卷把空喀山口事件、朗久事件、边界通信、印度驻藏机构待遇和噶伦堡问题编排在一起，从而将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外交摩擦与边界冲突联系起来。^⑨《白皮书》第6卷中，印度政府称中国力量“自1957年以来侵入”印度领土，并把中国行为描述为对既有边界状态的破坏。^⑩

另外，印度国内民族主义动员的需要，也推动了“中国扩张”叙事的传播。独立后的印度面临着将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社会整合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边界既标示国家领土范围，也承载主权和民族尊严等象征意义，为印度进行民族主义动员提供了切入点。《印度斯坦时报》在1962年以后大量使用“中国威胁”“中国祸患”“中国侵略”“中国扩张主义”等标题语言，将复杂的边界争端转化为便于公众理解的安全威胁。报道将中国在西藏、新疆、中印边界以及亚非地区的活动放入同一个“扩张主义”框架中，把“中国在

①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59, p. 86.

② 王宏伟：《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③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 9 (1963), p. 489.

④ 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⑤ Jawaharlal Nehru, “Press Conference,” April 5, 1959, 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48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3), pp. 206-217.

⑥ Jawaharlal Nehru, “In the Lok Sabha: India-China Relations,” December 21, 1959, 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55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p. 323-331; *Lok Sabha Debates*, 2nd ser., vol. 37, December 21, 1959, cols. 6266-6277.

⑦ “Throw out the Chinese, Ranga tells Govt.,”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14, 1964.

⑧ 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评述》（1956-2013），《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第92页。

⑨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White Paper III, 1960, pp. 3-4, p. 73.

⑩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White Paper VI, 1962, pp. 32-33.

亚洲的扩张主义”描述为对区域秩序的威胁。^①尼赫鲁在议会中的表态被概括为印度必须成为“武装起来的国家”，以应对“中国威胁”。^②由此可见，“中国威胁论”并不只是政府文件中的概念，而是已经通过媒体、图书市场进入城市公众的日常阅读和时事讨论。^③报道称中国“侵略印度”改变了德里人的阅读习惯，关于中国、西藏、中印边界和“中国心态”的书籍需求大增。^④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被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知识需求，普通公众开始通过“了解中国”来解释印度遭遇的安全危机。由此，政府、议会和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关系，媒体将“中国进入西藏”的表述情绪化地转译为“侵略”“扩张”“威胁”等；议会辩论则使这类“威胁话语”进入正式政治讨论；政府则通过公布的《白皮书》和外交照会等文件将这种话语建构重新表述为基于事实和文件的国家立场。报道显示，国大党通过决议，表示要继续建设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以“把侵略者从印度领土上赶出去”，同时强调尼赫鲁“接受外国援助但拒绝结盟”。^⑤因此，“中国扩张论”不仅服务于对外政策，也服务于国大党在危机中维持政治合法性：它既可以解释印度为何需要接受外援和加强军备，又可以维护印度“不结盟”的道义形象。

最后，“中国扩张论”还为印度此后采取更积极的边境政策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一旦中国被塑造成在边界地区持续推进的“扩张者”，印度政府在前沿的诸多部署都可以被解释为防御性行为，而不是主动改变边境的现状。1961年以后，印度逐步实施“前进政策”，在争议边境地区设立更多哨所，以显示并巩固印度的领土主张。拉加万（Raghavan）指出，尼赫鲁将此前危机处理中逐步推进、以有限军事措施显示决心并同时寻求外交解决的方式延用于中国危机；以往危机的处理经验使他过度相信印度能够控制局势的升级进程，从而在避免全面战争的同时维护其基本立场。^⑥马克斯韦尔（Maxwell）则从另一角度强调，印度政府在边界争端中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后来“前进政策”的形成，与国内政治氛围和边界问题公开化密切相关。^⑦面对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败，尼赫鲁政府必须通过强化国家安全叙事和内部整肃来回应国内政治压力。^⑧由此可见，只要中国被描述为不断向边境地区推进的“扩张者”，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行动就可以被描述为维护既有边界、恢复现状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印度政府之所以持续建构“中国扩张论”，并非源于西藏问题本身必然导向“中国威胁”的政治逻辑，而是因为这一叙事能够同时回应殖民边界遗产、外交危机应对与国内政治动员等多重现实需要。它既为印度解释其边疆安全焦虑提供了一套对华叙事，也帮助尼赫鲁政府将1959年以后不断升级的中印矛盾归因于中国的“扩张”行为，并进一步为民族主义动员和“前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由此可见，在印度政治话语中，西藏问题逐渐超出其原有地域范围，成为解释北部边疆安全和对华关系的重要议题，也使“中国扩张”叙事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话语进入印度的公共舆论环境。

结语

1959—1964年，西藏问题之所以成为印度对华叙事中的重点对象，关键不在于主权争议本身，而在于它为印度提供了批评中国治理行为的依据。尼赫鲁在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同时又强调西藏的自治权利，并将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与印度北部边疆面临的危险相联系。这使得印度官方能够在维持既有主权立场的同时，批评中国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现有的安全环境。《印度斯坦时报》刊载的相关报道、评论和来信，又将自治问题同“压迫”“侵略”等评价结合，促使西藏问题成为印度解释中国对邻国构成威胁的切入点。因此，考察中印关系的恶化，既要关注边境冲突本身，也需要注意印度如何借助对西藏局势的解释，判断中国的战略考量并由此评估自身对华政策的得失。

参考文献：

- [1] KHAN S W.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 [2] GUYOT-RÉCHARD B.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3]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White paper III[R].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① “‘Chinese expansionism a threat to Asia’,”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11, 1963.

② “India to become ‘nation in arms’ to meet Chinese menace: PM,”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27, 1963.

③ “Now they all want to know about the Chinese mind,”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24, 1963.

④ “AICC affirms resolve to push out Chinese: Build-up will continue; Foreign aid welcome but no alignment: PM,” *Hindustan Times*, April 7, 1963.

⑤ Srinath Raghavan, *War and Peace in Modern India: A Strategic History of the Nehru Years*, Permanent Black, 2010, pp.314-317.

⑥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antheon Books, 1970, pp. 211-228.

⑦ 朱鹏、张晓乐：《边境战争失败后尼赫鲁政府的应对策略》，《东南亚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31-46页。

Affairs, 1959: 3-4.

- [4] NEHRU J. Statement on Tibet[R]//LOK SABHA SECRETARIAT. Lok Sabha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Vol. 32, no. 21. New Delhi: Lok Sabha Secretariat, 1959-09-04: 3922-3923.
- [5]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J]. 1959, 5(3): 51, 89-90, 109-110, 121-133.
- [6]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J]. 1962, 8: 100-102.
- [7]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1964-65[R].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5: 105, 107.
- [8]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J]. 1963, 9: 489.
- [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record[J]. 1964, 10: 265.
- [10] Fighting breaks out in Lhasa: Tibetans resent Chinese order on Dalai Lama; demonstration before Indian Consulate[N]. Hindustan Times, 1959-03-21.
- [11] Chinese tell Indians not to visit Tibet[N]. Hindustan Times, 1959-08-24.
- [12] India must give her verdict on Tibet, says J. P.[N]. Hindustan Times, 1959-03-28.
- [13] Happenings in Tibet not an internal affair of China: Narayan urges fresh thinking on issue[N]. Hindustan Times, 1960-04-10.
- [14] The rape of Tibet[N]. Hindustan Times, 1959-04-23.
- [15] Naked aggression in Tibet[N]. Hindustan Times, 1959-04-03.
- [16] Panikkar's role[N]. Hindustan Times, 1963-12-06.
- [17] Chinese Reds a menace to Asian countries: Delhi convention proposal to rally world opinion[N]. Hindustan Times, 1960-04-11.
- [18] India should take lead in solving Tibet issue: Brockway's suggestion to J. P. Narayan[N]. Hindustan Times, 1959-04-12.
- [19] Kripalani calls for "strong, positive" action: Deadline sought for negotiations[N]. Hindustan Times, 1959-12-23.
- [20]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R].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59: 86.
- [21] 王宏伟. 喜马拉雅山情结: 中印关系研究[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113-114.
- [22] 尚劝余. 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1947-1964)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4.
- [23] NEHRU J.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48[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6-217.
- [24] 戴超武. 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 (1956-2013) [J]. 史学月刊, 2014 (10) : 91-115.
- [25]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White paper VI[R].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2: 32-33.
- [26] 朱鹏, 张晓乐. 边境战争失败后尼赫鲁政府的应对策略[J].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21 (3) : 31-46.

The Tibet Ques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ia's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ansion" (1959–1964)

Xue N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After 1959, the Tibet question became a central issue in Indian interpretations of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Indian official documents, Nehru's speeches, and reports in the Hindustan Times show that the Indian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while emphasizing Tibet's right to autonomy. As concerns over autonomy and refugees became linked to the security of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China's actions in Tibet were portrayed as altering the regional status quo. The press employed terms such as "oppression" and "aggression" to frame developments in Tibet as a broader threat to China's Asian neighbors. The colonial legacy of viewing Tibet as a buffer, together with political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rovided the context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ansion."

Keywords: Tibet question; Sino-Indian relations; Hindustan Times;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ansion"